

「租」從何來？「租」作何解？

廣東模式、尋租發展型國家與資本主義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資本主義如何在地球各個角落「逐水草而居」？地球上各個不同的社會如何回應資本主義？《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細膩地處理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本文以「租」為中心，分別就「租」的條件、「租」的創造與「租」的意義和《尋租中國》切磋。在指出《尋租中國》在中國經濟發展研究與社會學技藝上的重大貢獻後，本文從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的發展史的角度與《尋租中國》切磋。資本主義發展史就是一個全球擴張史，因此一定要探討資本主義與各個不同社會的互動或者連屬（articulation），如中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遭遇，特別是當中「社會主義的遺產」在創造「租」上所扮演的角色。由此，本文進一步從生產模式的連屬、世界觀的連屬與範疇的連屬來與《尋租中國》對話。其次，本文就「租從何處來」這個議題，提出以「剩餘價值」為中心的架構與《尋租中國》「全球價值鏈延伸」與「機構化尋租」的架構切磋。接著，本文就「租」的意義與《尋租中國》對話，並反思「意義」在因果詮釋與認識論上的角色。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說明了「理論對話」的不同作法。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尋租、發展型國家、剩餘價值、資本主義

台灣社會學第 39 期（2020 年 6 月），頁 137-166。DOI: 10.6676/TS.202006_(39).05

收稿：2019 年 8 月 22 日；接受：2020 年 5 月 25 日。

^{*}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etshieh@gate.sinica.edu.tw

On Rent: The Guangdong Model, 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Capitalism

Gwo-shyong Shie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book *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 in China* highlights the Guangdong model as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79 under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acting as institutional rent seekers patronize foreig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aking advantage of emigrant workers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the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This paper initiates a series of dialogues on the conditions, production and meanings of “rent,” a core category of the book.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m. Taking the legacy of socialism as an example of the encounter of local society with capitalism, a condition of rent-production and seeking, it then contrasts the framework of articulation studies (th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the articulation of worldview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native and capitalistic categories) with that of “expansion of the value chain” and “local growth alliance” proposed by the book. Unlike the book’s emphasis on rent-seeking, this paper calls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of rent itself and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rent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meaning vis-a-vis tha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t then briefly reflects on the so-called “theoretical dialogue.”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commit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a solid academic work.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rent 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 surplus value, capitalism

最近出版的吳介民（2019）專書《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以下簡稱《尋租中國》）探討中國出口導向工業化，一方面勾勒出戰後台灣企業西進中國的「拓荒史」，另一方面則準確點出中國自 1979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的過程與機制。

《尋租中國》從台商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台商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吳介民 2019: 3）、「世界工廠如何鍛造而成？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化的過程，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如何連結？其間台商扮演何種角色？」（吳介民 2019: 17）該書以廣東地區的發展當作分析的焦點，結合了宏觀的勾繪與微觀的台商企業個案發展史，細膩地指出：由地方政府與外資製造商組成的「地方成長聯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吳介民 2019: 64）。地方政府提供了庇護式關係網絡給外資製造商，而外資製造商則繳納各種形式的租稅，吳介民（2019）以「機構化尋租」來勾勒二者的關係。地方成長聯盟上有中央政府與全球價值鏈領導廠商作為隱形的結盟者，下有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的農民工，因為戶籍制度的歧視，一方面被地方政府「制度性排除」而未能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另一方面被外資製造商「雙重剝削」（資方對勞方的剝削，以及地方政府協助資方對勞方的剝削）。推動在地成長聯盟的動力來自全球價值鏈的延伸，促成了「在地鑲嵌治理」，形成了所謂的「廣東模式」，並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原型與典型（吳介民 2019: 68）。在這個模式中，作為外資製造商的台灣企業連結了全球價值鏈領導廠商與中國地方政府，運用農民工，不僅替中國創造了「第一桶金」，而且也替中國培養了中資生產生態系。最後，《尋租中國》比較中國與東亞諸國的經濟發展經驗，藉以凸顯中國個案的特徵，進而與全球化理論切磋。

本文以「租」為中心，分別就「租」的條件、「租」的創造與「租」的意義和《尋租中國》切磋。在指出《尋租中國》在中國經濟發展研究與社會學技藝上的重大貢獻後，本文從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的發展史的角度與《尋租中國》切磋。資本主義發展史就是一個全

球擴張史，因此一定要探討資本主義與各個不同社會的互動或者連屬（articulation），如中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遭遇，特別是當中「社會主義的遺產」在創造「租」上所扮演的角色。由此，本文進一步從生產模式的連屬、世界觀的連屬與範疇的連屬來與《尋租中國》對話。其次，本文就「租從何處來」這個議題，提出以「剩餘價值」為中心的架構與《尋租中國》「全球價值鏈延伸」與「機構化尋租」的架構切磋。接著，本文就「租」的意義與《尋租中國》對話，並反思「意義」在因果詮釋與認識論上的角色。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說明了「理論對話」的不同作法。最後，本文指出《尋租中國》結合了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而成為精彩的社會分析著作。

一、中國經濟發展與學術技藝

《尋租中國》在實質議題與社會學技藝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中國從 1979 年的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如何可能？「市場轉型論」指出中國經濟成長動能是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發展出來的，強調私人經濟誘因與自發性。《尋租中國》指出了市場說無法解釋的現象，如虛擬所有權與紅色資本家等「再集體化」現象。「國家中心論」強調地方官員在發展中的積極角色，但《尋租中國》指出這個說法忽略了幹部私人利益是推動工業化的重要誘因，也未區辨地方官員的不同角色（企業家、保護者、掮客等）（吳介民 2019: 41）。「外向型發展論」強調全球價值鏈由西方領導廠商向外延伸到中國，促成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吳介民 2019: 48）。《尋租中國》採取這樣的觀點，同時指出其不足之處：欠缺對與價值鏈發生鑲嵌的在地體制的政治分析。經由細密地與既有的論點搏鬥，《尋租中國》提出了「在地成長聯盟」、「機構化尋租」與「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等概念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的過程與機制，明顯地超越與深化了既有的論點。這是《尋租中國》的第一個重大的貢獻。

《尋租中國》的第二個重大的貢獻展現在社會學技藝上。首先是

結合了宏觀與微觀。《尋租中國》在對廣東模式做了宏觀分析之後，描述了台陽公司到中國的「生命史」，「提供本書宏觀論證的微觀基礎」（吳介民 2019: 131）。

乍看之下，《尋租中國》的焦點是制度與活動，但再一次細看，可以發現它對於「意義」層面的掌握也相當細膩。例如，在討論「中國製造 2025」的產業升級計畫時，它指出了美國政治菁英在主觀認知上研判中國企圖改變既有的全球權力結構，因此在政策上轉向防堵中國（吳介民 2019: 382）。再如，《尋租中國》指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民族存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政治穩定」的敘事緊緊扣連（吳介民 2019: 394）。

提問的轉化也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尋租中國》由描述性的提問開始，如：台商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吳介民 2019: 3）世界工廠如何鍛造而成？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化的過程，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如何連結？其間台商扮演何種角色？（吳介民 2019: 17）但《尋租中國》不僅止於這些描述性的提問，而且進一步轉化了這些描述性的提問。

這出現在地方成長聯盟中的一個核心機制：地方官員的尋租。一般的問法是：為何猖獗的尋租活動沒有導致經濟停滯？《尋租中國》指出這個問法的預設是自由主義式的市場資本主義：沒有政府管制，就沒有尋租行為，一旦有了尋租行為，就會干預市場正常運作，從而妨礙了經濟成長。但在中國，政府的管制無所不在，這樣的問法就必須修正。《尋租中國》將其轉化為：是什麼因素使得猖獗的尋租活動可以和經濟成長並存？接著將這個問題細分為對官僚的提問與對台商的提問：哪些條件使得官僚尋租活動不會惡化為純粹的財政掠奪？什麼因素使得台商願意接受尋租行為而持續在中國投資？（吳介民 2019: 342）針對前者，《尋租中國》提出的回答是：地方政府有相當寬鬆而富有彈性的管制權與審批權，可以切入價值鏈治理結構，攫取經濟剩餘，可以從中獲得預算外收益，補充地方財政，以及可以有個人利益，其效應是：讓龐大官僚系統願意從政治掛帥轉向經濟掛帥。

針對後者，《尋租中國》提出的回答是：官僚的保護與收租形成集中化的網絡，讓地方政府的行為可預測，降低尋租行為的交易成本（吳介民 2019: 347）。《尋租中國》並以「機構化尋租」來掌握這個關鍵的運作。因為精彩地轉化了提問，所以才能精準地掌握到讓中國經濟成長成為可能的關鍵機制。

這個精彩的提問轉化是透過下面幾個操作完成的：將原先關鍵辯論的預設上檯面、確立眼前的現象不符預設、另行提問、進一步細緻化，最後並創造出準確的概念來掌握提問所涉及的關鍵現象。這一系列的操作值得學習。

《尋租中國》的第三個成就是細膩的體制分析，它是以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的延伸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這個價值鏈透過外資製造商與地方政府結盟，共同運用農民工的勞動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制。

在分析造成農民工差別待遇的戶籍制度為何難以撼動時，《尋租中國》的回答是：

中國這套剝削機制，構成了共生結合的體制環節，從公民身分差序、二元勞動力市場、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地方治理到尋租發展型國家，環環相扣。因此，國家有強烈的動機維繫公民身分差序的持續運作，真正動搖到戶籍制度的根本改革便相當困難。……全球資本主義與民工身分體制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剝削機制。（吳介民 2019: 239-240）

一個完整的體制分析，包含了準確地掌握到造成眼前社會現象的各種關鍵機制、這些機制彼此的連結、這些機制如何構成一個整體性的運作，以及這個運作如何繁衍而削減了變遷的可能。《尋租中國》的分析展現了體制分析的優點。

不僅如此，《尋租中國》也追溯農民工體制的歷史起源：後毛時

期的自立更生，及其所蘊含的農工產品不等價交換，從而看到體制的連續性與變異性。同樣地，這套體制分析也用來說明當前美國與中國的矛盾。換言之，體制的分析讓社會變遷變得可以理解。

《尋租中國》以細膩踏實的社會學技藝，呈現了作為中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型與典型的廣東模式的特色。它提問精準，資料踏實，分析細膩，論點原創，理論對話深入，將是理解台灣與中國經濟和政治互動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的必讀之作。

二、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的發展

資本主義自十六世紀以來，就不斷向外擴張，「依其自身的形象」不斷攻城掠地，幾乎就是資本主義內建的特色。中國在 1979 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這部「史詩」晚近最吸睛的一個篇章。

資本主義在地球表面「逐水草（廉價勞動力）而居」的游牧與掠奪，已經廣為人知。美國的製造業在 1960 年代將生產工作移至日本，1970 年代轉向台灣、南韓與香港，1980 年代再轉向中國，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後，成為世界工廠，而隱隱然與歐美經濟強權抗衡。

換言之，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如何進入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如何回應的過程，研究者一定要處理兩個課題，一是在地社會的特色，二是在地社會如何與資本主義互動。因為「租」是《尋租中國》的核心概念，本文將以「租」為核心，分別就「租」的條件、創造與意義，與《尋租中國》切磋。

三、「租」的條件：「社會主義的遺產」

《尋租中國》指出這個資本主義游牧全球的新階段，是透過「全

球價值鏈延伸」向中國展開，並指出台商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從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這是台灣資本主義跨國發展的一章。《尋租中國》也指出：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的游牧與掠奪，會因為「草地」（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而有所不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游牧過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地方成長聯盟，其中包含了兩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機制：地方政府的「機構化尋租」與對構成勞動力的農民工的「制度性剝削」。

本文將從「社會主義的遺產」的觀點進一步申論。更精準地說，是以資本主義的定義性特徵來凸顯中國黨國主導的「社會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之處，進而說明這些特殊之處如何在中國轉向資本主義時發揮作用。¹

（一）社會主義的遺產是在地成長聯盟諸要素的沃土

首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原是兩個互斥的選項，但中國竟然可以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這如何可能？《尋租中國》以「地方成長聯盟」、「機構化尋租」、「農民工」等概念，細緻與準確地回答了這個謎題。那麼，這些機制從何而來？「孰以致之」？廣泛來說，答案可能就與社會主義的遺產有關。諸如地方政府被授權審批投資項目的大權，藉此向外商抽取人頭稅，以開闢預算外的財源，並可以為官員個人牟利，或者因戶籍制度被歧視的農民工等，都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遺產，提供了《尋租中國》所勾勒的地方成長聯盟各種要素與機制的沃土。

進一步申論，廣東模式讓我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關係。資本主義一向被看成是一種「經濟」體系，但是《尋租中國》凸顯了資本主義的「政治」面向。全球商品價值鍊向全球各地合適的地方延伸，本身是一個「經濟」動力，但在進入中國之後，帶來了特定的在地連結與地方鑲嵌治理（如機構化尋租與農民工

1 因而並非屬嚴格定義下的「後社會主義轉型」（post-socialist transition）的討論。

等）。地方政府不僅是裁判員，而且也是參與者，這是「政治」。「經濟」與「政治」如此細膩地糾結，成為一個不容易區辨彼此的整體。換言之，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形塑了改革開放以後「政治」與「經濟」的緊密關係。

進一步，本文將從資本主義關鍵要素的形成來考察社會主義的遺產，如薪資勞動力與生產工具。

（二）社會主義的遺產與資本主義的關鍵要素

1. 薪資勞動力的形成、供給與運用

薪資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的定義性特徵，那麼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在薪資勞動力的形成、供給與運用上，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1）社會主義的遺產帶來特殊樣態的無產化

就廣東模式底層的農民工而言，在中國，土地本來就是國有，農民沒有土地，因此沒有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農民被剝奪土地的無產化（proletarianization）；更準確地說，中國農民工經歷的是一種特殊的無產化：源自「社會主義」、而非封建主義的無產化。換言之，中國資本主義的第一批薪資勞動力，並非來自土地被資本家剝奪的農民。

（2）社會主義的遺產帶來不自由的薪資勞動力

再者，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將農民綁在土地上，農民沒有移動的自由，可說是「不自由」的薪資勞動力，而非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力。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力有兩個指涉：因為自由得一無所有，所以必須販賣勞動力，以及勞動力可以自由移動。而中國的農民工是一種半封建的薪資勞動，這是一種弔詭的結合，因為有人身束縛，就不是薪資勞動，是薪資勞動，就不會有人身束縛。更弔詭的是，資本家從這種半封建的薪資勞動可以更有效地榨取剩餘價值，從而促成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

綜合上述兩點，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的遺產帶來了特殊樣態的

原始積累。

（3）社會主義的遺產帶來了特殊樣態的原始積累

從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原始積累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直接生產者不再束縛於土地，二是直接生產者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他才能自由地販賣他的勞動力，三是直接生產者被剝奪一切生產工具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被迫地）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Marx 著、吳家駟譯 1991: 783）。

相較之下，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第一桶金與第一批薪資勞動力的產生，都與國家有關，從而與發生在十五世紀的英國的原始積累不同。

可以進一步申論的是：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只在十五世紀的英國發生一次嗎？形式都相同嗎？² 當代中國的例子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除了十五世紀以來的英國之外，全球各地都不斷地在發生原始積累。例如，中國的農民工從農村流入城市，卻沒有身分，而無法在勞動力的繁衍上受到國家的照顧，這也是原始積累的一種形式。再如，在資本主義鞏固後，原始積累還是可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不斷出現，如台灣國家暴力徵收農地、部落土地被商品化，或是國家透過工資與稅金政策來替資本案創造有利條件等。但由於資本主義已經鞏固，這些不再原始的「原始積累」激起的回應因而也不同。

如果能確認這一點，除了可以修正馬克思有關原始積累的論點之外，更可以深化我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即資本主義有內建的危機，所謂的「原始積累」可以被用來化解這些危機，從而不再「原始」，而是資本主義內在的機制。

2. 土地（生產工具）的來源

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的另一個要素是土地。最終講來，中國的

2 這是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開授「資本主義發展史」時，魏揚同學針對台灣當代的農地徵收提出的問題，我深受啟發，謹此致謝。

國家掌控所有的生產工具，讓改革開放以後的資本主義發展以特定的樣態呈現。農民工沒有土地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則是所有的土地與生產工具都屬於國家，因此當中國要發展資本主義時，其「第一桶金」就不像英國，必須透過圈地等機制剝奪農民，只需透過國家審批讓利、「虛擬產權」等來招商，這也是機構性尋租的條件之一。這不僅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是如此，即便在中國累積了大量資本之後亦然，如《尋租中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稱之，而中國官方則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如：地方政府炒作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國進民退」（國家資本壯大，民間資本萎縮）的發展傾向、晚進中國經濟的快速「金融化」等，都與此有關。

范疇（2012）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權本主義」（powerism）社會。雖然這可以凸顯當代中國黨國獨大的角色，但是忽略了這個獨大的黨國所統治的，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帶有資本主義要素的社會，當代中國從而有了不一樣的組合（configuration）。如何準確掌握這個組合的特色與運作邏輯，正是有關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的關鍵課題。此處要指出的是：「權本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是創造邁向資本主義第一桶金的制度背景。

這就導向了：資本主義的核心範疇（如「薪資勞動」、「資本」等）如何在社會主義中國中浮現？農民工如何看待他們自身的身分（是農或是工）與他們領取到的那筆錢（「工資」）？「資本」範疇又是如何浮現？「利潤」呢？浮現之後，它又是以什麼樣的樣態繼續發展？

從資本主義的關鍵要素來討論中國的社會主義的遺產的作用，就是在討論一個在地社會如何與資本主義的互動，本文將從「生產模式的連屬」的研究傳統來與《尋租中國》切磋。

四、從「全球價值鏈延伸與在地成長聯盟」到「連屬研究」 (articulations studies)

《尋租中國》的分析架構是透過全球價值鏈的延伸，分析全球領導廠商、外資製造商、中央與地方政府（幹部）與民工階級等行動者如何在廣東發展模式中互動，作者稱之為「地方成長聯盟」（吳介民 2019: 64）。《尋租中國》的重要發現是：這是一組「在地鑲嵌治理」的關係，地方政府與外資製造商是主要的行動者，前者提供了各種庇護，後者則繳納正式與非正式的租稅以為回報（「機構化尋租」）。在這地方成長聯盟之上，一方面中央政府賦予地方政府採取靈活政策的空間並向地方政府抽取剩餘，另一方面則是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導廠商向中國延伸價值鏈。創造剩餘價值的農民工階級一方面被地方政府「制度性排除」未能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另一方面被外資製造商「雙重剝削」（資方對勞方的剝削，以及地方政府協助資方對勞方的剝削）。要言之，《尋租中國》的主軸是全球與在地的連結，焦點是制度與在制度下活動與互動的行動者。

在學術發展史上，這種資本主義與在地社會的連結的研究相當豐碩，如「生產模式的連屬」（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這個研究傳統探究了：資本主義如何進入當地社會？當地社會如何回應？其機制與過程為何？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在這個意義下，《尋租中國》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生產模式的連屬」案例：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如何與資本主義互動？從生產模式的連屬的觀點來定位《尋租中國》，一方面可以凸顯其強項，另一方面則可以點出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針對上述問題，連屬觀點下的研究也不斷進展：由資本主義摧毀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轉變為資本主義既保存又利用非資本主義生產

模式；由兩個生產模式的單向關係，發展為雙向、動態的關係；由政治經濟學延伸到意義層次的連屬等，「生產模式的連屬」從而發展成「連屬研究」（articulations studies），這會延伸到下面的「制度、活動與意義」的討論。「生產模式的連屬」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分析架構。

底下將依序討論連屬研究傳統三個階段的發展：從生產模式的連屬、世界觀的連屬，再到範疇的連屬，並指出其對探討中國社會與資本主義互動的意涵，藉此來定位《尋租中國》，並摸索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空間。

（一）生產模式的連屬

柯志明（2003）處理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農民經濟的核心問題：「米糖相剋」。他提出的問題是：殖民主義下的資本主義與台灣的家庭農場關係為何？本地家庭農場透過什麼樣的機制與外來支配性的資本產生連結？他發現殖民資本主義既保存又利用了家庭農場。在殖民政府的協助下，日本糖業資本透過各種機制（如「原料採集區」與米糖比價制等）來萃取家庭農場的勞動成果。農民雖然繼續保有自己勞力的使用權並透過種種直接、間接的方式抵制糖廠強加的不利交易條件，日本糖業資本卻牢牢掌握了砂糖的製造與銷售，並且控制了甘蔗生產的外部條件，而得以獨享肥厚的利潤（柯志明 2003: 18）。農業生產商品化了，但並未將農民轉變為薪資勞動者。以此為基礎，他從階級與部門相對力量的觀點來解釋日本殖民時期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謎題：米糖相剋。

這個對連屬關係完整與深入的分析呈現了：外來力量（日本糖業資本與殖民政府，展現極大化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在地力量（台灣農民，沒有雇用薪資工人而以極大化效用為動力的家戶**生產模式**）、二者的關係（家戶生產模式既被保存又被利用）、所形成的剩餘萃取機制，以及其帶來的機會與限制。

這對於中國社會與資本主義的連屬有何啟發？首先，連屬的主

體是生產模式，也就是運用薪資勞動來創造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模式與運用無酬家屬來維生的家戶生產模式。可以確定的是，改革開放後進入中國社會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而迎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這意味著必須對所謂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進行細緻的考察。例如戶籍制度創造出來的農民工，是不自由的勞動力，另一個例子是國有土地的審批。在這個例子中，與資本主義連屬的，並非家戶生產模式（即其運作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中的不同要素（被管制的勞動與土地）。

其次，兩個生產模式的關係並非併吞或抵抗，而是可能發展出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為主導的相容與並存。這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模式中有可以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利用的要素。前面有關「社會主義的遺產」的討論或者《尋租中國》的細膩分析，都證實了這一點。

要言之，生產模式的連屬對於探討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的遭遇，深具啟發。

（二）世界觀的連屬（articulation of worldviews）

連屬不僅發生在不同的生產模式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的世界觀之間。Michael T. Taussig（1980: 13-14）發現，在 Colombia 的蔗田農場工作的工人，被認為是與魔鬼締約，用以增加生產及工資的人。締了這樣的約對於資本與人的生命有毀滅性的後果：用以買地，地無生產力；用以買牲畜，牲畜不會繁衍。這是因為工資不具生產力。同樣的，蔗田庫存中的種苗也沒有生產力：被一個與魔鬼締約的人所砍下的蔗幹，就不會再發芽。同時，與魔鬼締約的人不得天年，而且死得很痛苦。在薪資勞動的新條件下短暫的金錢所得，其好處被生育力的喪失與死亡所抵銷。但回到自己的農田，從事維生耕作時，其勞動就與神明或生育力相連在一起。

而在 Bolivia 的礦場，礦工創造了一個崇拜魔鬼的工作團隊，用以維持生產，找到礦脈，以及減少意外。他們認為魔鬼是錫礦與錫的真正主人。但是魔鬼也被認為貪婪的精靈，會帶來毀滅與死亡。魔鬼

是生產或者增加生產的支柱，但這種生產威信最終會毀滅生命。

Taussig（1980）指出魔鬼信仰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逐漸取代維生的農業生產，表達了農民在這個過程中經驗到的疏離，這是在地世界觀來理解與運作資本主義。

Jean Comaroff（1985）的世界觀更為全面，含括更多的層次。她勾勒在西方傳教士與南非 Tshidi 人的殖民遭遇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社會與文化邏輯。Comaroff 用了「形式上的連屬」來指稱在地社會文化與資本主義在經濟與政治面向的互動過程，如農村的基礎被瓦解、來回遷移的勞動人口、逐漸加強的普羅化：農村不足以維生，所以到農場與礦場工作，然而礦場與農場的薪資工作也不足以養家活口，所以必需依賴農村的耕作，結果是半農半工、亦農亦工，但二者皆無法單獨維生（Comaroff 1985: 40-41）。

相對於「形式上的連屬」，自然有「實質的連屬」，³ 這出現在 Comaroff 對傳教士與 Tshidi 人在文化與意識上的遭遇與隨其而來的結構轉化的分析。傳教士先引入了水井，影響了在地的政治與儀式關係（Comaroff 1985: 139）。因為酋長壟斷了祈雨儀式，水井打破了這個壟斷。引入的犁取代了鋤頭，生產效率提高，剩餘增加，男人介入農業。傳教士並試圖改造 Tshidi 的家屋的形式，使其成為一夫一妻、共財的核心家庭（Comaroff 1985: 140-141）。教會的時間表、日曆等，分化了 Tshidi 事件的連續流程與季節循環。識字帶來了社會分化（識字者與不識字者），新的抽象層次隨之出現：「字」不再鑲嵌在社會脈絡之中。這個過程與「貨幣」、「時間」的概念的發展過程類似，藉著識字將自己的象徵體系客體化，成為一個一貫的知識體（Comaroff 1985: 143-144）。Tshidi 人並將文字與報紙做圖像式的操弄（Comaroff 1985: 143），成為抵抗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的治療儀式中的一個關鍵要素。

Comaroff（1985）指出「生產模式的連屬」的焦點是生產力與生

3 她並未使用「實質的」連屬這樣的觀念，這是我由其「形式的」連屬推出來的。

產關係，而這二者原本是鑲嵌在更寬廣的物質的、意識型態的與倫理的關係之中，必須納入後者，才能全面地掌握到在地社會文化與資本主義及基督教的遭遇過程。她的連屬概念有兩個特徵，一是多層次，層次間的相互滲透（如政治、經濟與文化意識）是所有的社會體系的特徵，因此連屬涉及的是兩個社會文化體系邂逅時，多層次互動的過程，二是相互性，連屬是兩個形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單方面的影響（Comaroff 1985: 154），當中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如 Tshidi 人運用基督教元素來療癒資本主義帶來的傷害。這是一個歷史過程，其結果是包括了傳教士代表的社會文化秩序與 Tshidi 在地社會文化秩序的新實在。

這對於中國社會與資本主義的連屬的啟發是：中國社會帶著什麼樣的世界觀來理解資本主義？幾個可能的答案：冷戰、黨領導國、「共產」的大鍋飯（如「單位制」）、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人際信任的瓦解等。

其次，在地社會的世界觀既讓資本主義變得可理解，同時也可能成為抵抗資本主義的要角。不僅如此，在地社會也可以反過來利用西方文明（如基督教）的要素來對資本主義做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方面的實況為何？這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課題。

（三）在地範疇與資本主義的連屬（articulation of native categories and capitalism）

資本主義如何與台灣在地社會連屬？從台灣社會來看，謝國雄（1992；1997；2003；2013）從事頭（外包體制中的分工）、價值（計件制度）與在地範疇（「互相」、「份」、「命」、「運」、「做」等）來切入這議題。在地範疇以四種方式與資本主義連屬，分別是：（1）報導人以在地範疇來理解與運作資本主義、（2）報導人活用地範疇來進行批判、（3）資本主義的運作轉化在地範疇，以及（4）在地範疇因為勞資爭議而與法律範疇邂逅後帶來的辯證發

展。從資本主義來看，則是考察在地社會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核心範疇，如「工資」，對其進行社會文化的詮釋。底下我分別說明這組動態轉化的過程。

「互相」是台灣勞動者理解勞資關係的一個在地範疇，這在發生勞資爭議時，呈現得特別清楚。「從少年做到現在，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旺季時努力加班配合，淡季時卻藉口請假頻繁被解雇，而雇主破壞了「互相」的情分。再如，勞動者自認對公司忠誠，公司就應該有照顧義務，不該抹黑解雇（謝國雄 1997）。

勞動者在向雇主爭取工資、預告工資、資遣費、退休金時，真正在乎的不是精確的數目，而是因為連素樸的權利都被雇主侵犯了，所以「要出一口氣」。這是要向雇主宣示：勞資之間的「互相觀」已遭到破壞，勞動者要討回一個公道。職業災害的協商也是以「互相」的原則來展開：「互相」以人情義理與對等交換（久任則需照顧）呈現，節制了「人肉市場」，以及因為互相觀破裂進入法律場域，目的是促成「互相」的體現，依法論法只是達成這個目的的一個手段。

勞動者除了透過在地範疇來理解勞資關係之外，也會創意地活用地在地範疇進行批判，展現能動。高雄唐榮工會理事長龔進興以「命」與「剋」來描述他與董事長與總經理的關係，兼具了「如實」、「超實」與「顛覆」的意涵，同廠失業勞工陳進義感嘆他與陳水扁總統有相同的「命底」（同姓陳），但卻有天壤之別之際遇，當中糾結了反諷、怨嘆、抗議、看穿與認命（謝國雄 2013）。

在地範疇也會被資本主義改變。在職業災害中，勞動者起初都會以「走壞運」來解釋職業災害。隨著受災者對事故的勞動過程上的原因的掌握越來越清楚，那麼「壞運觀」也就越來越少會被提及，如：流程協調出問題（上一步驟的人操作不當、模版未固定、通風機未固定好）、機器出問題、加班與趕工、老闆未提供足夠的訓練等。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工人沒辦法啦！」，指的是工人面對有問題的機器、具有危險性的工資與工時安排時，是無從注意安全的，也就是沒有抵抗的空間，只能接受這種來自雇主的單方面安排，是「從屬性」（聽

命於雇主)的展現。當然經驗老到的工人也會對從屬性，提出「建設性的抵禦」(謝國雄 1997: 246)。一旦體會到「從屬性」的威力，那麼「壞運觀」的歸因就會減弱。

最後，在地範疇與法律範疇邂逅後，帶來了辯證的發展。前面提及，勞動者在向公領域求援，雖說是要出一口氣，但在爭議上，卻必須以勞動基準法的語彙與形式出現。勞動基準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作為勞動者一個籠統的後盾，代表勞動者的主張可獲得國家法律的支持。而勞基法中關於請求數額的細緻規定，則常為勞動者本身的價值觀及勞資倫理觀所形塑與修正。這些規定的數額不是一個底線，而是一個陌生的標準(謝國雄 1997: 164)。換言之，當在地範疇與法律範疇邂逅時，相互作用，最後帶來了一個新的整體，但仍以在地範疇為主，法律範疇為輔。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資本主義的核心範疇(如「工資」)如何被台灣的勞動者所理解來切入。舉例而言，我們看到「純勞動」(「有做有錢，沒做沒錢」)(謝國雄 1997)以及「全括商品霸權」(謝國雄 2013)。此外，在對「工資」範疇進行社會文化詮釋時，在地範疇也會被啟動，如上述的「互相」。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以重新概念化的方式(「純勞動」與「全括商品霸權」)來總結有關在地範疇與資本主義的連屬，用以回答台灣資本主義中的志願性順服及其挑戰的問題。

這對於中國社會與資本主義的連屬有何啟發？簡單地說，就是要探討中國社會在地範疇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連屬。舉例而言，中國社會如何理解「工資」、「資本」、「利潤」、「財產」、「市場」等資本主義的核心概念？在這個理解過程中，他們帶入了哪些中國社會的在地範疇？其次，在連屬的樣態上，在地範疇不僅用來理解、運作與批判資本主義，本身也會被資本主義轉化，呈現出了動態的辯證發展。

讓我們聚焦到《尋租中國》：上面這些討論對於我們理解《尋租中國》有何意涵？

首先，「生產模式的連屬」架構的進展是否可以「含括在地成長聯盟」，並且捕捉到「在地成長聯盟」忽略的面向與動力？我們從兩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一是發生關係的兩造是什麼？是不同的生產模式、不同的世界觀、或是不同的範疇？《尋租中國》關注的是各種制度（如「在地鑲嵌治理」），大體上可以類比到連屬研究第一階段的生產模式，對於「世界觀」或者「範疇」的連屬，較少著墨，因此連屬研究中「不同世界觀與範疇的遭遇與互動」，可豐富「在地鑲嵌治理」，稍後我們在「租的意義」這個課題中，將進一步探討「意義」層次的連屬。

二是這兩造又是如何發生關連的？是既保存又利用、是透過行動者的象徵性實踐或是對在地範疇的活用？以「在地鑲嵌治理」來說，當然比「鑲嵌／不鑲嵌」更為精細，但「不同的生產模式間的矛盾、保存或利用」，不僅扣緊剩餘價值生產與分配、薪資勞動力及其形成的樣態（如中國的農民工），以及原始積累的過程與機制，也更能細緻區辨不同的運作邏輯間的關係。

其次，《尋租中國》以全球價值鏈的延伸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這個價值鏈透過外資製造商與地方政府結盟，共同運用農民工的勞動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制。從連屬研究來看，可以說：「全球價值鏈延伸」、「地方成長聯盟」與農民工的剝削等均為「連屬」的機制，這些連屬機制帶來了創造大量剩餘價值的條件，從而讓機構化尋租成為可能。

具體地說，尋租猖獗但不影響經濟發展，台商一定要有高額的利潤，這個高額利潤來自相對於台灣十分廉價與充沛的勞動力（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意味著較低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可以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加上台商在廣東擴大生產規模，整體剩餘價值大量增加，才足以應付地方官員的尋租。⁴

4 這是一個可以驗證的假說：在農民工不再廉價後，機構化尋租是否能持續下去？這是審查人的洞識，我深受啟發，並將這個洞識連結到我主要的論證，也就是「連屬創造了機構化尋租的關鍵條件：大量的剩餘價值」。但願我能指名道謝這位匿名的審查人！

簡言之，台灣資本主義經過三十多年的積累，向外擴張，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與中國社會連屬；農民工低廉的工資與擴大規模所需的廉價土地正是這個連屬的重要面向；而這個連屬帶來了創造大量剩餘價值的條件，機構化尋租與地方成長聯盟從而成為可能。

連屬創造了尋租的條件，但「租」本身從何而來？「租」的意義又是什麼？在分析完「租」的條件之後，本文接下來將探討「租」的來源與「租」的意義，藉此來與以「租」為核心範疇的《尋租中國》進行聚焦的對話。

五、「租」從何來？ 從「全球價值鏈延伸」到 「剩餘價值之創造與積累」

「租」從何來？第一種答案是如前述：「租」是從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的連屬而來。但更精確地說，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的連屬只是創造了「租」產生的條件，連屬本身並不會生產租。比較精準的說法是：「租」來自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來自勞動過程，而勞動過程受到連屬的影響。

以中國當代資本主義來說，《尋租中國》發現了地方政府的關鍵角色，而地方政府參與地方成長聯盟的動機是尋租，但「租」從何來？《尋租中國》指出「租」來自農民工創造出來的價值與剩餘價值。⁵ 她（他）們是如何創造的呢？這就是勞動體制（labor regime）的課題。

《尋租中國》回顧了三個有關中國勞動體制的個案，並做出三個評論。在勞動體制的性質上，有的研究判定是專制，有的則判定是霸權，《尋租中國》認為要留意歷史脈絡（早期專制，晚期霸權）與分

5 連屬研究出自馬克思傳統，剩餘價值自是其關注的焦點。

析的面向（如帶入台資廠區中的宿舍）。其次，《尋租中國》也指出農民工的趕工（加班）遊戲，是因為低底薪的關係，是被迫，而非自願，因此不是「布若威遊戲」（the Burawoyian game）。在國家角色上，中國國家介入勞動體制，並非為了改善勞動條件，而是參與了剝削勞工的競賽（吳介民 2019: 266-268）。

這裡有三點值得進一步討論。首先，《尋租中國》呈現的現場勞動經驗的面向不夠全面。我們看到了工時、加班、低工資、日常生活的抗爭（如拆宿舍水龍頭、丟饅頭等），但欠缺工作現場的實作（如在台陽公司的個案中，這方面的資料不多），而這正是勞動體制主要的呈現。其次，在勞動體制的確立上，我們較少看到各要素（工資、工時、宿舍、抵抗等）的交互作用與連結而形成一個整體的體制。由於這部分是援引既有研究，不能苛責《尋租中國》。

進一步，從《尋租中國》的分析架構來看勞動體制，需要思考下面三個問題。一是勞動體制是價值與剩餘價值被創造與被掩飾的機制，因此對於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如何與在地條件連屬，十分緊要。二是在這個理解下，重新思考勞動體制的角色：勞動體制在廣東模式的角色為何？勞動體制在「全球——產地聚落——在地體制連結」（G-D-L）的分析架構中的角色又是如何？勞動體制在全球價值鏈延伸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三是《尋租中國》描述的各種要素（公民身分差序、二元勞動力市場、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地方治理、尋租發展型國家等），如何打造了勞動體制？⁶ 這是《尋租中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可以超越既有中國勞動體制研究的地方，可以好好發揮。

從剩餘價值的架構來看《尋租中國》的整體架構，可以發現：「全球價值鏈延伸」是資本尋求與創造剩餘價值並進行資本積累的展現；「公民身分差序」、「二元勞動力市場」、「等差化社保方案」

6 《尋租中國》確實正面處理了農民工，但重點是放在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而不是農民工實際的勞動過程與勞動經驗，也就是說，剝削的條件多於剝削本身。

是有效創造剩餘價值並進行不公平分配的條件與手段；而「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地方治理」、「機構化尋租」等，則涉及剩餘價值的分配。⁷

要言之，《尋租中國》凸顯了剝削的條件與後果，但是剝削本身（剩餘價值的產生）的討論同樣重要。換個方式來說，《尋租中國》的重點在剩餘價值的分配與創造剩餘價值的制度性條件，但並未深入處理剩餘價值的創造本身。未來可以進一步處理剩餘價值的掩飾，如農民工為何願意接受薪資勞動——涉及了薪資勞動力的主觀性準備、在勞動過程中的實作經驗、社會主義的遺產的影響等。在分析資本主義發展史，大部分研究的焦點都放在剩餘價值的創造、佔用與分配，較少處理剩餘價值如何被掩飾的問題（如透過商品形式、勞動過程與工資形式）（Marx 著、吳家駟譯 1991；Burawoy 1979；謝國雄 1997；2003；2013）。將剩餘價值的掩飾（或者資本主義的呈現樣態）帶入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將可以開啟對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新理解：在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不同階段，是否有不同的掩飾機制與展現（如商品形式、勞動過程與工資形式的比重與組合）？

此外，在剩餘價值的創造上，可以進一步分析勞動過程中的實作；在剩餘價值的分配上，除了地方政府的機構化尋租之外，也可以進一步探究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雇主對於剩餘價值的佔有。延伸來說，這對診斷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危機，也可提供另類的觀點。

就理論層次而言，《尋租中國》是以全球價值鏈的延伸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這個價值鏈透過外資製造商與地方政府結盟，共同運用農民工的勞動力。本文則以剩餘價值的創造、積累與轉化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同時探討這個動力在不同的時期面對不同的調節

7 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邏輯（剩餘價值的創造與積累）是類似的，但因為中國特殊的在地條件，帶來了特殊的調節模式。以台灣為例，1960 年代以來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是在「外包積累體制」（透過外包來連結生產、所得、分配與資本動態發展）與「純勞動調節模式」（工資買的是勞動成果而不是勞動力）的運作下展開的（謝國雄 2019），這兩個概念指出了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動態：資本從何而來、如何積累、受何種內部因素調節等面向。

條件而有不同的展現。上述的討論試圖指出：《尋租中國》的分析架構，會因為以「剩餘價值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邏輯與調節」的架構而有更簡潔、一貫與深入的表達。廣東模式作為台灣資本主義發展西進的拓荒史，將因此而有了新的與整體的理解。這就涉及了社會科學中兩個同樣值得追求的目標：普遍性與特殊性。本文的看法是：這二者相互建構。如果沒有普遍性的參照，特殊性就無法顯現出來。反之，如果沒有捕捉到特殊性，普遍性就無法呈現。表面上看起來，普遍性與特殊性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其實是相輔相成。二者的關係，接近陰陽邏輯的相生相剋。

六、「租」作何解？意義層次上的連屬

如前所述，意義面向（如世界觀與範疇）是連屬研究的重要課題。《尋租中國》展現了多層次的分析：制度、活動與意義，如對美國政治菁英對於中國意圖的主觀認知與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敘事。

同樣精彩的是對工繳費匯差不同命名的解讀（吳介民 2019: 166-167）。一般稱為「人頭稅」，有時則會被稱為是「管理費」；台商與地方政府互動順利時，被稱為「掛靠費」，而關係轉壞或破裂時（如中方莞強公司威脅要換合作對象的台陽公司時）則被稱為「保護費」。

同一筆費用，對不同的行動主體，在不同的時間點，處於不同的制度形構中，就會獲得不同的符碼命名，並承載截然不同的主觀感受。（吳介民 2019: 166）

面對這些「同質異名」的「流動的意符」，《尋租中國》辨識出其本質是「政商交易費用」，然後以「機構化尋租」來重新概念化。「工繳費的匯差」、「人頭稅」、「管理費」、「掛靠費」、「保護

費」等，是報導人對同一套制度的不同解讀，而「機構化尋租」則是《尋租中國》發展出來的分析性概念。這是立基在報導人的經驗之上所做出的詮釋，其效應是：拉高抽象化的層次，引入知識圖譜（「尋租」），並且定位了眼前的研究（廣東案例的尋租有何特色）。這是嚴謹踏實的分析工作，令人讚賞。

本文從四方面來與這個精彩的分析進行對話。一是將這個精彩的分析由雇主延伸到勞動者，二是採取以剩餘價值為中心的架構來詮釋，三是正視「意義」面向的因果性地位與認識論上的意涵，四是意義體系上的提問。

首先，如此細膩與敏銳的意義之勾勒並未同等地被運用到勞動者。經營者的聲音蓋過勞動者的聲音，勞動者主觀的意義世界值得進一步細緻掌握，並將其連結到《尋租中國》精彩的地方成長聯盟與勞動體制的制度分析。例如，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工資」、「資本」、「利潤」、「財產」範疇的浮現與發展，即是轉型過程中，扣緊制度的「意義」面向的重要課題。這裡可以參照台灣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研究：由事頭的描述（外包制度中的層層細分工）（謝國雄 1993），延伸到制度的分析（外包制度的運作）（Shieh 1992），再深入到意義世界的掌握（「純勞動」、「工資」範疇的社會文化意涵等）（謝國雄 1997；2003；2013）。

其次，從「工繳費的匯差」、「人頭稅」、「管理費」、「掛靠費」或是「保護費」到「機構化尋租」，扣緊了報導人的理解與制度的運作，已經是圓融自足、精彩深入的分析，為了激起對話，本文提出不同的概念化方式來與《尋租中國》切磋。

延續前面由「全球價值鏈延伸與在地成長聯盟」轉變為「剩餘價值之創造、分配與積累」的討論，那麼在意義層次的分析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不論是「工繳費的匯差」、「人頭稅」、「管理費」、「掛靠費」或是「保護費」，《尋租中國》精準地將其概念化為「機構化尋租」。「機構化尋租」這個概念試圖掌握的是「機構化」，不是「個人性」的尋租，而是整個組織甚至整個制度，都在抽取租

金。再者，「機構化尋租」這個概念的另一個重點是「尋」，找尋、追求、抽取租金。換言之，「機構化尋租」的重點是「機構化」與「尋」而非「租」。

以「租」為中心來考察，不論是「工繳費的匯差」、「人頭稅」、「管理費」、「掛靠費」或是「保護費」，都是一種「租」，而「租」來自勞動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可以說報導人的各種命名是對剩餘價值的主觀理解，本文稱之為「剩餘價值的變身」，也就是說，上述各種稱呼與「機構化尋租」都是剩餘價值的變形。這兩種對意義的詮釋各有強項：「機構化尋租」凸顯了「租」的分配的制度條件，指出了資本主義與在地社會的連屬，而「剩餘價值的變身」則直接聯繫到資本主義核心的運作與動力。

雖然這兩個不同的詮釋架構各勝擅場，但在「意義」層次的角色上，二者則有重大的差異。《尋租中國》之所以細膩捕捉這些主觀的意義，其目的是「捕捉到其流動的歷史時刻，在結構的縫隙中，觀察一個制度如何浮現，而後又如何隱沒」（吳介民 2019: 167）。換言之，制度的變遷是其分析的焦點。反觀「剩餘價值的變身」則是要指出意義層次在建構社會實在上不可化約的角色。要言之，剩餘價值必須以在地（其他）的理解（「工繳費的匯差」、「人頭稅」、「管理費」、「掛靠費」、「保護費」或是「租」）出現，才能成為剩餘價值；如果剩餘價值以其本來面目（被雇主無償佔用的勞動成果），那麼將引起各種爭議。剩餘價值，非剩餘價值，是名「剩餘價值」。⁸「租」的多樣意義呈現了資本主義核心範疇（「剩餘價值」）的在地理解，是一種意義層次的連屬，有其特殊的效應。⁹意義層次的詮釋從而導出了認識論上的多層次實在。

除了在這個認識論上的差異之外，本文也賦予了意義層次在社會變遷上的重要角色。例如《尋租中國》中的工繳費制度的變遷讓原

8 參見謝國雄（2013）重新概念化「結構」時所提出的「結構，非結構，是名『結構』」。

9 參見前面「在地範疇與資本主義的連屬」。

來的主觀期待不符公平對等，但這種主觀的認知讓原來的制度無法順利運行，從而凸顯主觀的意義在分析與詮釋上的角色。¹⁰ 生產模式的連屬是一個多面向的過程，因此，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再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制度轉折一定觸動制度、行動與意義的相互糾結，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問：在地文化體系、認知範疇如何與資本主義制度連屬而帶來多層次的相互影響與變遷？由此可以對歷史制度論以及「政治經濟學分析與文化詮釋的整合」做出貢獻。¹¹

最後，是意義體系的提問。上述有關美國決策菁英對於中國議題的主觀認知與習近平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敘事，與「全球價值鏈延伸」、「地方成長聯盟」、「機構化尋租」、「公民身分差序」等又有何關係？

這不僅符應了前述連屬研究傳統從著重制度運作的政治經濟學延伸到世界觀與範疇的文化詮釋的發展，更試圖探究制度、活動與意義三個面向的連結與互動。這也例證了社會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掌握制度運作的邏輯，描繪制度下的活動，捕捉這些活動體現出來的意義，並且勾勒另類的可能與理想。¹²

七、結論

（一）總結

「租」是《尋租中國》的核心範疇，本文分別就「租」的條件、創造和意義與這本書對話。在創造「租」的條件與「租」的分配上，

10 Viviana A. Rotman Zelizer (1979) 指出十九世紀美國壽險業者面對「生命有價」這個違反基督教信仰的障礙，凸顯了壽險的道德價值：「善終」從濟助窮人以圖死後靈魂獲得救贖，蛻變成在死前做好個人財務規劃，以免讓最親近的人孤苦無依。金錢的「銅臭味」現在不再衰潰死亡，而其「神聖性」因此而被凸顯出來。這說明了「意義」的轉化是社會變遷中不可或缺的要角；既有的意義是新制度的阻礙、賦予制度新意義、新意義與既有意義相容、新制度順利運作。「意義」既是社會變遷的阻力，也是社會創新的來源。

11 謝謝夏傳位教授的提醒。

12 如何解讀與捕捉制度、活動與意義的互動？本文的看法是：制度與活動是意義的象徵，亦即：制度與活動因為呈現有關社會的各種意義而成為社會分析的對象。

《尋租中國》的分析細緻且精彩。在「租」的創造與「租」的意義上，《尋租中國》確實有觸及，但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尋租中國》提出了全球價值鏈延伸、在地成長聯盟、機構化尋租等的分析架構，十分準確而深入地掌握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動態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是否可以發展出不僅可以更全面地捕捉到中國在地社會與外來資本主義的互動，同時也可以更簡潔地掌握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動態的另類架構？針對前者，本文提出了「連屬研究」的分析架構；針對後者，本文則提出了以「剩餘價值」為核心的分析架構，藉此來與《尋租中國》切磋。本文分析了社會主義的遺產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角色，接著從連屬研究的觀點來考察《尋租中國》中的「租」。在討論完「租從何來」與「『租』作何解」之後，現在可以反思「理論」對話的意義與價值關懷在學術研究中的角色。

（二）「理論」對話

《尋租中國》的理論指涉有二，一是因果機制（是什麼力量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市場、國家或是全球價值鏈？），二是事實發展的型態（pattern），如全球價值鏈延伸、經濟發展中國家的特定角色（發展型國家）、全球化的帶來特定的後果等。

「理論對話」從而就有兩種意義，一是在因果機制上，確立各個因素的角色，並加以綜合，提出較為精準的因果機制，二是探詢中國案例是否符合某一個事實發展的型態，如果不符合，則提出不同的概念，如提出「在地鑲嵌治理」，一方面準確掌握「全球價值鏈延伸」，另一方面細緻化經濟社會學中的「鑲嵌」概念。

就此而言，《尋租中國》做得十分踏實、細膩與精彩，幾乎不能多置一詞。因此，本文要做的「理論」對話，是提出不同的分析架構來與該書的分析架構切磋，如「『剩餘價值』為核心的架構 vs. 『全球價值鏈延伸』」、「生產模式的連屬 vs. 『地方成長聯盟』與『地方鑲嵌治理』」，以及「『剩餘價值的佔用與掩飾』 vs. 『機構化尋租』」。這樣做的目的是立基在《尋租中國》的架構上，發展出更

簡潔、更深入的分析架構，藉以掌握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運作邏輯。¹³

理論對話的另一個意義是不同的分析架構是否指出了原有分析架構較未著墨的面向，如不同於制度與活動的意義面向。這涉及了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如對於那筆工繳費匯差，有報導人的命名與理解（「人頭稅」、「管理費」、「掛靠費」、「保護費」等），有《尋租中國》的重新概念化（「租」），以及本文再次的重新概念化（「剩餘價值」）。重新概念化是十分重要的理論對話。

（三）「意義」與四位一體的學術實踐

「意義」是推動《尋租中國》的研究與寫作的一個動力，但是以隱含的方式來呈現，這就導向價值關懷與學術研究的關係這個課題。

《尋租中國》的序中提到：

前後二十五年的摸索，帶我回到提問的起點——**台灣的出路**——這個問題本無簡單的答案，但本書提供解謎的工具。我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我們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吳介民 2019: viii）（粗體為本文所加）

這段序言透露了兩個重要的訊息，一是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緊密連結，二是有清明的分析，才能有準確的診斷與有效的介入。《尋租中國》對於廣東模式的起源、轉型與未來的關注，繫念於評估「中國製造 2025」（吳介民 2019: 367）等，都體現了這兩個精神。

《尋租中國》的作者吳介民因為關心台灣社會，所以關心中國的

13 這個核心運作邏輯可以更有系統地分析現狀與預測未來發展，如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各種形式的資本之動態變化（「國進民退」、「金融資本」之壯大等），當中涉及的是剩餘價值的創造、佔用與轉化。謝謝鄭瑋寧教授指出此點。

發展。研究中國，是為了探詢台灣的未來。在存在論的價值關懷的觸動下，他進行中國的研究，並以嚴謹的學術研究，對於中國效應、台灣的未來等公共議題，提出新的看法，促成以研究成果為基礎的公共辯論。這形成價值關懷與學術研究的良性循環，或者說，是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的四位一體（謝國雄 2007）。

觀點就是盲點，本文採取了特定的觀點來解讀這本精彩的專書，一定有其盲點，期待藉此促成進一步的對話。

誌謝：朱泓錦、夏傳位、黃崇憲與鄭瑋寧教授在本文不同的階段，提出中肯深入的建議。兩位審查人專業而細膩的評論，以及編委會鍥而不捨的逼問，有效地協助作者釐清了本文主要的論證。林靜怡小姐耐心編校本文，蔡嘉信先生做最後的校閱。對此深深致謝，但所有可能的不足與缺失，責任仍在作者。

參考文獻

-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
- 范疇，2012，《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新北：八旗文化。
-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 137-160。
- ，1993，〈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活化：台灣小型製造單位創立及存活過程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 93-129。
- ，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編），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
- ，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9，〈經濟社會學觀點下的「台灣奇蹟」：現象、重新概念化與另類可

能〉。《台灣社會學》37: 99-130。

Marx, Karl 著、吳家駟譯，1991，《資本論》。台北：時報文化。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maroff, Jean.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ieh, Gwo-shyong. 1992.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Taussig, Michael T. 198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Zelizer, Viviana A. Rotman. 1979.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